

# 2011年：推而不動的中國政改



2011年的大幕已經落定。曾經在前一年由中國政府首腦溫家寶刺激起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熱望，幾乎降到了冰點。顯然，2011年中國幾乎沒有可以稱得上是改革的舉措。這一年中國的運作模式依然故我：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仍然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在「中國模式」的凱歌猛進中不斷自我確證，社會則徘徊在希望與失望、祈求與絕望編織成的激進化狀態中。改革的壓力與改革的遲滯之間，形成了遠比2010年更大的鴻溝。社會確實在推動政改，但到頭來只能以「推而不動」來形容。無奈的是，中國人和世界上一切以良善之心期待中國朝向現代縱深處健康發展的人們，只好將自己的希望連同不可抑制的失望，帶入到2012年的新年景之中。

2011年中國幾乎沒有可以稱得上是改革的舉措。這一年中國的運作模式依然故我。改革的壓力與改革的遲滯之間，形成了遠比2010年更大的鴻溝。社會確實在推動政改，但到頭來只能以「推而不動」來形容。

## 一 政改壓力的驟增

2011年的中國社會政治局勢，國家的喜事與民間的悲情突兀地呈現給世人。國家甚隆其事的大事，除開年初例牌的兩會之外，年中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年尾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執掌國家政權六十餘年的中國共產黨，已是幾近百年的老大政黨了。執政黨領袖胡錦濤在回顧九十年歷程時，不無自豪地做出了兩個宣告：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他以中國共產黨完成的三件大事對之提供了證據。一是「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二是「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黨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此三件大事足以說明，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

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由此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①：

事實充分證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在這樣的政治敘事中，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都密密實實地隱匿起來了。試想，一個治國理政如此得當的政治組織，有甚麼必要啟動改革呢？

在年尾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執政黨領袖再次將中國現代政治的正當性資源悉數收歸己有。一方面，強調「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另一方面，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由此推導出來的政治結論是：「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找到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國人民付出艱辛努力、作出巨大犧牲，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②於是，堅持現有政治體制就不僅是歷史預示的鐵定結論，也是現實證明的正確做法。

從紀念這兩件大事的政治宣言來看，推動改革絕對是從屬於宣告政治體制正當性的事情。兩次政治告白，將這樣的政治姿態非常鮮明地呈現給世人。但是，政改真是可以不慍不火、緩慢處置的政治事務嗎？2011年中國社會政治傳遞出來的種種信息，似乎與這樣的斷言恰成悖反。年初兩會上，全國人大常委的負責人做工作報告的時候，一方面高調宣布建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以前述同樣的政治口吻宣告了現行政治制度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強調了執政黨進行改革的政治底線：「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③這麼嚴肅的政治宣言，出自國家權力機構的掌權者之口，本身就耐人尋味。即使不追究其中的玄機，人們也會發現，在「五不搞」的政治布告中，明顯具有回絕相關訴求的意味。這無異於向世人證實，中國社會存在着「五要搞」的客觀要求。

這樣的要求，可能是理論上的研究結論，但由於這樣的研究結論觸及到了執掌中國國家權力的政治組織的自身利益，因此在其向政治行動延伸的時候，被及時中止；或者也可能是執掌國家權力的組織內部，已經有人指出這五個政

政改真是可以不慍不火、緩慢處置的政治事務嗎？在「五不搞」的政治布告中，明顯具有回絕相關訴求的意味。這無異於向世人證實，中國社會存在着「五要搞」的客觀要求。「五不搞」的政治誓詞，顯示出執政者對政治面臨改革的高度緊張感。

治制度安排(不管要不要搞)，是解除執政困局的出路，因此引起國家權力高層的政治警惕，於是不得不進行政治急剎車；更有可能是因為執掌國家權力的高層領導群體，意識到中國社會對之已經形成了某種政治共識，因此不得不緊急宣布堅決不搞的決心，以絕後患。總而言之，「五不搞」的政治誓詞，顯示出執政者對政治面臨改革的高度緊張感。

觀察2011年中國社會的現實，人們確實可以覺察到瀰漫開來的政治改革訴求。從社會階層的表達來看，精英群體對當下運作的政治體制或者當前顯現的政治狀態的不滿，溢於言表。

從個人政治態度上講，張木生就指出政治發展停滯的危險性，「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sup>④</sup>這樣的表示，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改革的緊迫感和焦慮感。

從集體性活動來講，2011年有兩次聚集了不少政治精英參與的座談會，體現了這一群體推進政改的意願。一次是8月27日召開的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與會者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必須守住〈決議〉所體現的徹底否定『文革』、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也一分为二的底線；對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能用『文革』的方式處理，而應該通過繼續全面改革開放，尤其是通過鞏固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來解決。」<sup>⑤</sup>另一次則是10月舉辦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與會者也形成了共同看法，那就是「35年前的10月6日，黨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這是人民的勝利，是民心所向。粉碎『四人幫』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是現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新紀元」<sup>⑥</sup>。這些似乎中規中矩的政治表達，卻透露出了推動中國進行政改的明確願望，展示了精英群體對政改的自覺認識。考慮到前一會議幾乎百人與會，後一會議近三百人參加，將之讀作精英群體對自己政治願望的聚合性表白，是完全不為過的。

與精英群體的做法不同，社會公眾對於改革的呼喚，不是以政治聚會和學術辭藻來進行的，而是以社會抗議和群體行動來凸顯的。5月26日，江西撫州錢明奇爆炸案，可以被讀作是公眾開始意識到「以暴易暴」、反抗社會壓迫的標誌性案件。5月中旬，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抗議煤礦開採污染環境導致的命案，引起5月下旬全盟族眾與學生抗議遊行，接着又引發5月底呼和浩特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民眾上街抗議活動。6月初接連發生在廣東潮州古巷鎮和廣州增城新塘鎮的群體事件，是兩起本地民工與四川籍民工大規模持械鬥毆和互相報復的群體事件。種種社會危機性事件的爆發，促使人們意識到中國現存社會政治制度確實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端。因此，無論是從現有體制的功能還是結構上看，都有花費巨大力氣進行改革的必要。這已經是一個無可否認的、鐵定的事實。

由上可見，政改的壓力，在2011年不是有所紓緩，而是驟然增加。

與精英群體的做法不同，社會公眾對於改革的呼喚，不是以政治聚會和學術辭藻來進行的，而是以社會抗議和群體行動來凸顯的。無論是從現有體制的功能還是結構上看，都有花費巨大力氣進行改革的必要。政改的壓力，在2011年驟然增加。

## 二 政改的兩個心魔

中國社會歷經三十餘年的無序發展——即以「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論」（摸着石頭過河）引導的改革，既喜出望外地獲得了經濟總量的疾速增長，又引發了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然而真正能夠解決這些社會矛盾、持續供給經濟發展以動力的改革，幾乎沒有實質性的推動，而且一直為掌權者所故意規避。到了2011年，執掌國家權力的最高領導人，也意識到日益興起的複雜社會危機對於執政黨的國家治理構成了嚴峻的挑戰。為此，春節剛過，執政黨最高領導人就提出了八點意見，以改進嚴重落後於形勢需要的社會管理現狀<sup>①</sup>。這種看似理性、平靜的「意見」中，實實在在地透露出黨—國家最高領導人急切的政治擔憂。

這種擔憂，即使在歡慶執政黨九十年大慶的時候，也無法抑制地透露出來<sup>②</sup>：

很顯然，中國社會是需要改革來疏導壓力的。在底層的不滿與抗爭、精英階層的離心離德中，呈現出及時救治妨礙人們強化國家認同的社會政治弊端的必要。不過，救治這些弊端，必須由國家權力當局積極回應才有可能。

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可見，面對社會—政治存在的嚴重問題，執政黨最高領導層確實有些憂心如焚。但不能不看到的是，黨—國家權力當局面對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時，似乎有些縮手縮腳、束手無策。處在明確的社會政治緊張感之下，當局卻未能推出任何有助於改變這種總體處境的有力舉措。

至於社會領域日益積累的不滿、憤懣、怨恨甚至仇恨，也是紆緩無門、難以發洩。從社會精英群體來看，理性推動改革的願望，從整體上講沒有改變。但是，不同精英群體對於現實的失望感明顯增長，只不過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經濟精英群體由於敏銳地感受到「五不搞」中，不搞私有化對於自己財產的威脅性，因此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據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 (Bain & Company) 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個人境外資產增長迅猛，2008至2010年中國個人境外資產年均符合增長率達100%。中國高淨值人群境外資產佔財富的比例正在逐年攀升，從2009年的16%上升至2010年的19%。近60%接受調研的高淨值人士表示考慮移民。其中，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受訪者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sup>③</sup>這種大規模的移民，極具象徵性地體現出經濟精英群體對國家認同程度的明顯降低、對於資產安全的極端不安全感，以及對現行社會政治體制的拒斥心理。

文化精英群體在國家認同方面的表現呈現為矛盾的態勢。從社會影響力上講，演藝界明星的移民<sup>⑩</sup>，給整個社會摹描了一幅對國家離心離德的畫面，但移民者卻照樣在國內佔據謀取經濟利益的有利地位；知識精英的移民，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知識精英流失最嚴重的國家。而這些人士之所以移民，主要導因是社會政治環境的安全問題<sup>⑪</sup>。即使是數量龐大的貪官出逃，也主要是奔向美、加等國，似乎透露出他們對那些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偏好<sup>⑫</sup>。

至於社會底層群眾發洩自己的不滿，則常常訴諸群體事件或個人的暴烈行動(如自殘行為、暴力抗法等等)。

很顯然，中國社會是需要改革來疏導壓力的。在底層的不滿與抗爭、精英階層的離心離德中，呈現出及時救治妨礙人們強化國家認同的社會政治弊端的必要。不過，救治這些弊端，必須由國家權力當局積極回應才有可能，因為社會直接改善國家權力導致的問題，和平的方式就只有呼籲這一個途徑，不然就只有選擇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政治願望。

可見，官民雙方對於中國嚴峻的社會現實的感知和自覺，在未曾成功引發政治改革的當下，只能被認讀為改革遭到了嚴重的阻礙，因此無以出台並發揮作用。對於改革阻力的分析，人們一般認為完全來自於權力當局。但是，通過前述分析，可以發現這一斷定難以成立。事實上，黨—國家權力當局的領導人確實一直深感改革的壓力，而社會也一直在顯現着有利於推動這一改革的態勢。但改革千呼萬喚未出台的原因究竟是甚麼呢？深入探究下去，人們可以發現阻滯中國進行改革的兩個心魔：一是官方求穩怕亂的心魔，二是民間做大收益拒付代價的心魔。官方的政改心魔可以解釋為，一旦進行改革，天下必將大亂，政權定必傾覆。對「亡黨亡國」的畏懼，戰勝了殺出一條改革血路的勇氣。而民間的政改心魔可以表述為，一旦進行改革，秩序必然喪失，身家性命必然遇險，安於現實與祈求小恩小惠的心態，遮蔽了公眾理性推動國家發展的眼光。兩者不謀而合，構成當代中國妨礙政改的強大力量。

官方的政改心魔，自然來自於權力的自私性。對於權力來講，它天性的敏感，促使其規避任何危害權力穩定性的風險。因此，維護權力的既定機制，成為保障權力不受挑戰的前提條件。就不同權力結構對於權力極力維護的特點而言，民主權力是受到權力制衡和權利制約的多重限制的權力形式，因此推動某些社會政治改革乃是不得不而為之的事情。民主政權不可能以違背社會的意願來捍衛權力的地位。但集權專斷的政體形式，由於國家對社會的輕蔑，權力的自我確證與孤芳自賞特性非常突出。因此，權力的自我維護，也就成為其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任何影響權力獨佔的自閉做派<sup>⑬</sup>。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國家權力及其執掌者在清醒的情況下，會意識到存在權力危機的事實，但要觸及危及權力延續的改革閥門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表現出慎之又慎的退縮態度。於是，啟動改革就變得異常艱難。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卻不願意「輕舉妄動」啟動改革最直接的原因。

阻滯中國進行改革的：一是官方求穩怕亂的心魔，二是民間做大收益拒付代價的心魔。官方的政改心魔，自然來自於權力的自私性。民間的政改心魔，來自於一個長期缺乏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必然的政治定勢。

民間的政改心魔，來自於一個長期缺乏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必然的政治定勢。對於一個散沙般的社會來講，人的主體定位就是含混與模糊的。因此社會行動者的從眾行動，完全是投機性的。由於人們長期不在組織化的狀態中生存，組織成為約束人們理性行動的「單位」，實際上造成所有個人被完全約束起來的政治強控狀態。於是，人們的行為模式就只能是：要麼孤獨地承受來自國家權力的壓制，要麼孤立而衝動地挑戰體制力量。人們在可以忍受現狀的情況下，對於生活中種種不滿，常常敢怒而不敢言，內心逐漸扭曲為一種自私的怪誕念頭：個人內心強烈的自主心不斷升騰，但卻指望別人給自己爭取一塊實現自主的地盤。至於承擔自主的責任心，則被自己全力約束起來，以免受到國家權力或輕微或嚴厲的種種懲罰。

官方的清醒認識與民間的改變現狀欲求，都是中國啟動改革的動力。但官方維護權力的本能衝動和民間安於現狀的自私自利，卻又瓦解了內生的改革動力。國家的政體改革，就在這種生發動力又消解其效能的惡性循環中，耗費掉了政體改革的重要機遇。

加之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給普通公眾帶來了不少的好處，人們總是在一種貪婪心理作祟的情況下，指望不冒丟掉任何利益的風險，卻可以得到更大利益的滿足，並以此來對待風險指數較高的改革。於是，民間對於改革風險的完全迴避，事實上也就完全窒息了社會空間中必需的改革活力。至於民間那些對社會政治現狀忍無可忍的人，便選擇離國而去；一般公眾，則繼續在悶悶不樂中祈求不需付出任何代價的滿意生活。他們甚至對那些推動改革的人們懷抱一種憤憤然的心理，因為他們的行動，可能危及自己可大可小的既得利益。

官方的清醒認識與民間的改變現狀欲求，都是中國啟動改革的動力。但官方維護權力的本能衝動和民間安於現狀的自私自利，卻又瓦解了內生的改革動力。國家的政體改革，就在這種生發動力又消解其效能的惡性循環中，耗費掉了政體改革的重要機遇。

### 三 政改：國家權力的徘徊彷徨

誠如前述，對於中國的改革而言，無疑存在兩種動力源：一是國家權力對於政改的積極推動，二是社會公眾對於政改的大力推進。這是需要分別加以審視的兩個方面。從前者看，對於國家權力的掌控者來講，是不是啟動政改至關重要。假如他們願意啟動政改，首先遭遇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從哪裏下手，才能將政改控制在自己預期的、既安全且幾乎沒有風險，同時又集聚人心而強化黨國認同的範圍內？很顯然，這是難於滿足的政改條件和改革結果。

但這確實是中國當政者面對政改時真實而悖謬的處境。正是由於改革對於官方權力的超級穩定性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或正面挑戰，因此，迷戀一黨獨大制專斷權力的黨政當局，自然不可能全面啟動政改。但是，中國社會的局面催促當局進行政改的壓力卻與日俱增。於是，在超級政黨內部容納的政治精英中，或者是想有所作為的人、或者是具有政治圖謀的人、或者是對現狀不滿的人、或者是捍衛現狀的人、或者是試圖回流到以政治高壓維持穩定的文革秩序的人，紛紛出來表達自己對於當前局勢的看法與做法。於是，人們就觀察到權

力當局內部出現的所謂「分裂」情形。顯然，「分裂」的斷言過於主觀，但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明顯不同的政治意見，則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些不同意見，通過掌握政治權力的高層領導人個人之間的表現差異、借助區域之間發展方式的不同、取道社會事件處理的手段與舉措選擇的區別，呈現在世人面前。

就黨—國家的最高層領導者來講，他們之間對於改革的看法，就給人完全不同的印象。黨的最高領導人一直致力於大讚小彈，使人不清楚其明確的政治主張和政改意見，國家權力機構的領導人明確以「五不搞」表達了捍衛現有政治體制的決心，但中央政府首腦卻一再申述自己啟動改革的決心和信念。

在前一年數次公開倡導政改的政府首腦，在2011年9月於大連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與企業家進行座談，再次公開表達了自己推進政改的想法，以及五個要做的重點工作：第一，堅持依法治國；第二，要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第三，維護司法公正；第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第五，堅決反對腐敗<sup>⑭</sup>。

第一點是其強調的政改之重中之重：「一個執政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並且嚴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就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為此，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這個任務是鄧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來的，我認為在今天尤為緊迫。」第二點關乎疏導社會不滿的問題，試圖以公平分配改變權勢集團獨佔改革開放成果的現狀，讓人民得以分享發展的好處。第三點則是撬動政改槓桿的支點，以保證公平正義社會的體制建構，「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司法公正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這個方向。」第四點則是規範權力來源的問題，其中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受到強調，並刻畫了選舉從村委會上升到鄉鎮一級的路線圖；在選舉權得到凸顯的基礎上，黨內民主成為推進民主的重頭戲再次被提出來。第五點是作為權力重建信任的問題提出來的，主要著意解決權錢勾結問題、推進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限制權力消費（俗稱「三公消費」）的膨脹態勢。

而政府首腦認定，在五項工作的先後排序上，「最為重要的，也是難點和重點的，就是有序地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毫不動搖地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堅持反腐敗鬥爭。」這樣的表述，顯然不同於年初國家權力機構負責人講話的宗旨，而且與執政黨領袖的講話旨趣也不盡相合。民主導向的改革，在體制內還是有認同者和提倡者的。只不過認同者與提倡者形單影隻、孤身魅影，讓人不敢對之懷抱付諸實施的信心。

就地方領導人的表現而言，面對中國社會發展出現的進退兩難的僵持局面，也大有可圈可點之處。此前已經啟動的「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之爭，確實給人一些真憑實據，因為兩地的領導人對於改變中國發展僵局的想法，確實具有明顯的個性差異。據《重慶日報》報導，2010年12月19至20日，在重慶市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薄熙來指出，要千方百計改善群眾生活，

正是由於改革對於官方權力的超級穩定性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或正面挑戰，因此，迷戀一黨獨大制專斷權力的黨政當局，自然不可能全面啟動政改。但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明顯不同的政治意見。

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走出一條在顯著改善民生中加快發展的路子。他強調，社會成果應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蛋糕」就會做大做好<sup>⑩</sup>。

而據《南方日報》報導，在2011年7月11日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汪洋指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必須堅決摒棄傳統發展模式，適應新形勢、新情況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實現廣東科學發展。要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考核發展成績，不僅要看經濟總量、發展速度，更要看發展質量、生態環境；不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做好，不斷減少做「蛋糕」的成本，提高做「蛋糕」的效率，切實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更實在的福祉<sup>⑪</sup>。

薄熙來和汪洋兩人對於中國發展問題的解困，口徑顯然不一，指向明顯不同，而人們對之的解讀，就更是南轅北轍。「做蛋糕」與「分蛋糕」的論述，無疑強化了人們對兩種模式象徵着的「中國道路」完全不同的感受，並且成為人們揣摩中國改革走向的風向標。

薄、汪兩人對於中國發展問題的解困，口徑顯然不一，指向明顯不同，而人們對之的解讀，就更是南轅北轍，過度詮釋了。但其中透露出來的政治見解的差異，是不能被輕忽的。加之此前重慶高調的「唱紅打黑」和廣東的制度建設優先，已經被人們認讀為中國下一步行動的兩種模式。因此，「做蛋糕」與「分蛋糕」的論述，無疑強化了人們對兩種模式象徵着的「中國道路」完全不同的感受，並且成為人們揣摩中國改革走向的風向標。

無論是中央高層的不同表態，還是地方官員的側重點差異，都顯示了中國縱深化改革的施展困境。2007年由執政黨給出的中國改革時間表與路線圖，看起來在相應時限內很難實現預定目標，而政改的路線看來也是難以啟動、更是難以推進的。就前者看，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要完成中國改革的任務，將是非常艱難的；就後者看，從黨內民主推進到社會民主的進展路線，在起點上就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而推進的路線實際上草圖難繪、舉措難明。



重慶長江大橋一帶的城市面貌



從起點上講，一個奉行列寧主義的高度集權政黨，從來就得依靠「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剛性一律」來維持。這樣的政黨定位，是很難切入競爭性因素的。一旦黨內民主引入題中必有之義的競爭因素，政黨的高度一統局面被打破，政黨本身的生存危機就必定出現。這對慣於依照舉國體制辦事的集權政黨來講，意味着脫胎換骨的改變。從社會民主來看，一個渙散的社會狀態、缺乏民主習性的公眾、不知自治為何物的民眾，如何可以進入理性的民主妥協空間，並且與政黨的黨內民主對接，就更是一筆糊塗賬。

可見，宏觀總體上是可以輕鬆談論「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這一話題的，但從實際政治操作上看，這一路線的可行性讓人高度懷疑。中國共產黨一向以氣勢恢宏的政治布局來領導國家，而對於制度的布局和設計一向掉以輕心，因此在面對具體開展政改的任務和舉措時，陷入茫然無措，也就在意料之中。於是，中國共產黨受制於自己的列寧主義政黨定位，又受制於自己設定的改革先天前提，即維護自己的一黨統治地位，其推動改革的施展空間便受到嚴重局限。故而面對政改，「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尷尬處境就此塑就。國家高層領導人之間似乎矛盾的表態，地方領導人左衝右突的對立性表現，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國共產黨受制於自己的列寧主義政黨定位，又受制於維護一黨統治地位，其推動改革的施展空間便受到嚴重局限，尷尬處境就此塑就。國家高層領導人之間似乎矛盾的表態，地方領導人左衝右突的對立性表現，也就在情理之中。

#### 四 政改：權利訴求的激進化走勢

至於促進中國改革的社會力量，其主觀動機和具體行動，相比於國家權力體系的有序且克制的反應而言，就顯得無序且複雜得多。無疑，一個由無序的市場經濟之手塑造出來的偽多元社會，是絕對無法形成關於改革的基本共識的，並且只能愈來愈激化人們的政治願望，使其陷入不知所措的政治迷惘而難以自拔。2011年，社會公眾的各種訴求在引人矚目的公共事件激化之下，便明顯體現出激進化的走勢。這一激進化的態勢，可以從四個方面得到認知：

一、是公眾的群情激憤。除了前述公眾的抗議所表現的激憤之外，2011年中國公眾總體上的激憤體現為對國家權力當局的極度不信任，以及公開對抗權力的行為傾向。就前者看，「7·23」溫州動車組事件最具有象徵意義。動車組事件是一個悲劇。無疑，長期以來作為獨立王國的鐵道部，製造了太多令公眾不滿的事件。但因為其壟斷經營，人們無可奈何。動車組事件給了人們發洩不滿的機會，而且將這種發洩，通過鐵道部直洩下來，衝擊了整個權力體制的社會信用體系。即使是民望甚高的政府首腦出面，也不足以平息相關憤懣情緒。就後者論，社會蘊積已久的不滿，已經開始發展到對權力的直接對抗行動。11月21日，廣東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數千村民走上街頭，高舉「反對獨裁，懲治腐敗，反對官商勾結，還我耕田」標語，抗議非法徵地。在同一個村子，早在9月份數千村民因不滿土地被佔未獲賠償，連續四天示威，痛斥當地官員私賣村民土地，並將收益私吞。上千村民上街抗議，毀壞並推翻警車，爆發警民衝突，

多人受傷，四名示威者被捕。11月18日，廣東省花都區數百名民工上街追討薪水，高喊口號遊行示威，打出大幅橫幅「還我血汗錢」、「我要吃飯」等。這些事件不能被認讀為屬於一個特定地區的公眾對抗權力的孤立事件，而只能被認作先發地區為中國發展先行引爆了政治炸彈。換言之，權利對抗權力的局面業已形成，改革權力的結構與功能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二、是公眾對於他人生存狀態和社會道德問題的極度冷漠。在一個黨—國家權力不受約束，因此必定高高在上的政治局面中，社會公眾絕對是不受權力重視的。即使權力偶爾俯身屈就，表現出一些看重民眾的姿態，但也無法獲得民眾內心的認同。相沿已久的權力與權利的疏離狀態，必定造成公眾對於他人、對於社會的冷漠心理定勢。10月發生在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儘管政府首腦和全國民眾異口同聲地譴責十八個路人未積極施救、聲討碾壓小悅悅的司機喪盡天良，但權勢者和公眾甚少檢討權力的平等感帶給公眾的友愛感問題。一個極度冷漠的社會，絕對是極度囂張的權力製造出來的；一個不受約束的黨—國家權力，絕對是對民眾冷漠已極的惡行淵藪。11月9日，深圳發生令人詫異的「世界頭號窩囊男」事件。聯防隊員當着丈夫的面強姦其妻子，而丈夫竟然不敢吱聲，既不敢呼救、更不敢報警。這自然也是一起悲劇性事件。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表現，不能不讓人驚嘆中國社會的正義底線已經被徹底突破了。對人不具有友愛精神，對己不具有自保能力，這樣的社會不進行深度的再造，怎麼能支撐起一個富裕而文明的社會大廈呢？

三、是權錢勾結的社會，將公眾肢解為碎裂的狀態，使他們無以形成共同的政治意志、社會願望和國家認同。在權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社會政治鴻溝。微博空間中群情洶湧的民情與國家電視台上鶯歌燕舞的場景，形成了這種分裂最鮮明的對比性畫面。而在國家財富的分享上，這種社會分裂局面，就更是突兀地呈現出來。在金融保險、股市證券、對外貿易、國土開發、大型工程等重要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是高幹子弟。政府官員公費吃喝、公款旅遊、公車開支的「三公消費」至少在9,000億元以上<sup>⑦</sup>。正是這種由分享財富極度不公造成的社會分裂，使得社會共識幾無塑造空間，而社會與國家的積極互動自然缺少契機。

四、是公眾介入公共政治領域活動的極度低能，造成理性政治落地的空前困難。中國公眾一向缺乏理性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也缺乏與掌權者平等地商討問題的經驗，更缺乏組織起來以社會對抗國家的無端侵害的經歷，因此，中國公眾長期是在臣民與暴民之間兩極奔走的：在可以忍受政治高壓的情況下，他們極具忍者精神，予人以對現實政治滿意度甚高的印象；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非理性的反抗便驟然興起。自陳勝、吳廣以來「揭竿而起」的非理性暴民行動模式，兩千餘年未曾改變。這也是中國當代交疊出現的矛盾，顯現為呈幾何級數增長的群體性事件的深沉導因。而群體性危機事件的偶然爆發機制，則投射出公眾反抗權力的無法把握、不能分析、難以疏導的特質。在現代社會中，公眾與國家的積極互動，是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前提條件之一；公

權錢勾結的社會，將公眾肢解為碎裂的狀態，使他們無以形成共同的政治意志、社會願望和國家認同。權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社會政治鴻溝。微博空間中群情洶湧的民情與國家電視台上鶯歌燕舞的場景，形成了這種分裂最鮮明的對比性畫面。

眾與國家權力的全然疏離，則是一個國家畸型的政治模式得以延續的支持條件。可見，改變公眾的乏力感，關乎中國理性啟動改革的社會基礎。需要強調的是，公眾的低能不是天生如此、無法改變的，那是集權政治體制長期弱化公眾的自主、自治與自律的能力導致的。因此，重新將社會理性地組織起來，乃是改變這一既不利於社會自治、又不利於國家政治發展的雙重消極局面的必由之路。

權利訴求的激進化，一向是革命的社會發動機。毫無疑問，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循環，正在這樣的激進化遞增狀態中，顯示出又一輪惡性循環的開端。如何「使人心平靜下來，使每個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勢群體得到幫助，使大家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sup>⑩</sup>，成為考驗中國當政者和普通公民的共同難題。就當政者言，年初中共高層會商社會管理的問題，顯示情況已經嚴峻到刻不容緩、必須正視、亟需解決的地步。就普通公民論，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看開去，促使個人欲求與國家發展的目標相對接近一些，則是一個重新塑造國民政治性格的大難題。

這是一個必須由國家與社會雙重力量推進的社會成長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複雜問題。首先，中國社會急需成長起來。社會的成長，一方面，就公民個人而言，需要公民理性地自主、自治與自律；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上增強公共關懷，在表達個人意願的時候強化相鄰意識，在協調日常關係的瑣碎事務時相互體諒。另一方面，就公民的組織化活動方式而言，需要促使公民進入一個組織化的活動狀態：促進他們加入各種因不同機緣組成的公民利益組織和公民興趣組織，促進他們在不同公民組織之間積極展開分工與合作，促進公民組織之間與國家相應權力機構相互間的政策博弈和施加良性影響。再一方面，就公民對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認知與定位上看，需要培育公民自覺認識國家權力限度的能力，對於全能國家保持適度的警惕性；而且需逐漸降低對國家權力的依附程度，與國家拉開距離，隨時準備與國家權力討價還價。此外，還需要促使公民真正成為人民主權的真正主體、促使公民嚴肅認真地履行公民職責，而不是吊兒郎當地對待諸如選舉等項公民權利。

其次，國家對於社會的成長，既要做好心理準備，也要提供及時的制度保障，更要讓渡出社會成長的政治空間。對於一個全能的革命黨而言，從來缺乏接受一個獨立於自己政治意志的社會的心理準備。因此，執政黨必須在轉變革命黨政治習性的時候，真正落定在執政黨的位置上，從而習慣於執政黨面對異己、面對輪替、面對競爭的嶄新處境。同時，國家必須提供讓社會健全成長的制度空間。社團登記與管理必須走上法治軌道，從根本上改變視社團為政治對手的陰暗心理；並且在制訂國家政策的時候，學會諮詢相關社團的意見、學會考量顯在的、潛在的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取向，從而真正告別全能政黨與全能國家習以為常的舉國體制、群眾運動與戰爭模式。

再次，國家與社會之間需要不斷練習相互間平等博弈的「功課」，提高彼此的政治博弈技巧。無疑，在國家高度壓制社會的情況下，國家毋需考慮社會對其政策的接受度與支持度。但是，當社會龐大到國家無法全面控制，而必須讓

在現代社會中，公眾與國家的積極互動，是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前提條件之一；公眾與國家權力的全然疏離，則是一個國家畸型的政治模式得以延續的支持條件。可見，改變公眾的乏力感，關乎中國理性啟動改革的社會基礎。

渡社會自治空間的情況下，國家就必須練習與社會的良性博弈。對轉變中的全能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考驗。對襁褓中的社會來講，這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因此，長期處在散沙般的社會狀態的公民，政治上的臣服與反叛一直呈現兩極跳躍的狀態。而要促使他們避免兩極跳的思維習性和行為模式，必然經歷一個艱難的轉變過程：在初期，公民缺乏政治表達的技巧，因此對國家的要求一定是道德化的、全方位的、索取性的；在認識到政府無法兌現其全能承諾的過程中，公民會逐漸了解到政府的宏觀能力與公民自己的微觀自治之間，必須達成一個各盡所能、劃界而治的成熟理念；直到長期博弈促使雙方摸索出自己的所能與局限的邊界之後，國家與社會的理性合作才能真正實現。

中國改革中必須包含降低公眾激進化情緒的重要內容。一個憲政民主政體的最大社會功用，就是促使公民理性自治，與國家良性合作，從而避免公眾情緒極端化，陷入抵抗國家的革命化泥淖之中。

可見，中國改革中必須包含降低公眾激進化情緒的重要內容。一個憲政民主政體的最大社會功用，就是促使公民理性自治，與國家良性合作，從而避免公眾情緒極端化，陷入抵抗國家的革命化泥淖之中。

## 五 改革，抑或傾覆？

2011年，中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業已展開的相關改革，還未能直接上升到真正改革的高度，還停留在缺乏國家基本制度建構意義的試探水平上。這與中國社會的疾速發展，形成了明顯的脫節。需要肯定的是，2011年初執政黨領袖在北京強調社會管理的極端重要性之後，體制上的改革已經着手：

一、是中央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已經改稱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不過這一委員會是不是應該由主管日常暴力機構的政黨領導人掌管，還需要考慮。因此，這一委員會的職能，還讓人們存疑。但起碼這一安排讓人將信將疑的是，體制的鬆動還是有空間的<sup>⑩</sup>。二、是為了疏導社會的嚴重不滿，引導社會自治，國家開始放鬆社團的嚴格登記制度，起碼已經讓公益性的社會組織放開登記<sup>⑪</sup>。而且在地方層面上，出現了放開八類社會組織的非掛靠登記<sup>⑫</sup>。民政部官員甚至罕見地表示，最終將放開所有民政組織的登記<sup>⑬</sup>。三、是配合黨政官員財產的登記制度、政府預算的公開和「三公消費」的嚴格限制等舉措，行政上將推出更多的改革做法。10月下旬，執政黨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似乎認識到價值重建對於國家持續發展具有的重大意義。將這些舉措連貫起來看，改革似乎在緊鑼密鼓地着手推進。

但總的說來，這些舉措都只具有改革的微弱意義和邊際清理作用。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最嚴重而迫切需要改革的問題，還是權力來源及其合法、和平和有序的更替問題。這是一切政治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解決中國政治體制種種梗阻現象最關鍵的環節。但顯然，關乎國家權力的授權機制、全能政黨的制度化改造這類影響中國政治體制運作的實質性問題，尚未觸及。2011年內，中國社



重慶一家專唱紅歌的KTV

會各個階層的人們對中國改革的強烈失望情緒，便因此鑄就，未曾出現積極改變。

在人們嚴重質疑權力是否自願且主動地傷筋動骨、對自身結構的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造的情緒中，「改革幾經走入死胡同」的斷言不斷浮現。於是，2011年借助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話題，影射史學再次成為中國人發表自己政治見解的安全渠道。所謂「改革與革命賽跑」的論斷，一時成為熱議的話題。而對於改良的強烈偏好，對於革命的無條件拒斥，構成了對時局判斷的鮮明對壘性意見。「中國究竟往何處去？」的質疑聲，再次甚囂塵上。而「重慶模式」是回到文革和復辟封建的議論，一時讓地方主政者力闢謠言、以正視聽。「廣東模式」究竟是否代表了中國制度化改革的走向，抑或是否構成「改革中國」的罪惡淵藪，也為人們廣泛議論。著名民間思想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為此舉辦專門的研討會，以清理相關思路<sup>23</sup>。重慶聚集專家深入討論其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也可以被視作重慶的一種自辯和道白<sup>24</sup>。但不管理論上如何探究，區域發展模式怎樣選擇，黨—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更替機制問題，一直沒有進入中國改革的軌道。就此而言，一切關乎中國政治體制的要素性重組，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優化來說，都只是意義極為有限的嘗試，都不足以真正平復中國社會的傷痛，都難以開創中國的現代規範政治局面。

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自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從現代規範政治理論的視角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狀況，主要是這個國家權力當局的政治姿態注定的。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士究竟有一種甚麼樣的價值取向、對於政治問題的判斷是否準確精到、是否能夠審時度勢啟動必須的改革，都對國家的政治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這需要具有勇氣和智慧的政治家把握時局、因勢利導、強力推動。但環顧當今中國，卻是政客與官僚主宰局勢的國家。國家政治改革

黨—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更替機制問題，一直沒有進入中國改革的軌道。一切關乎中國政治體制的要素性重組，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優化來說，都只是意義極為有限的嘗試，都不足以真正平復中國社會的傷痛，都難以開創中國的現代規範政治局面。

的危急處境，促使人們深切呼喚政治家的出場。政客與官僚掌握國家權力與社會需要政治家的客觀處境，形成了權力與社會脫鈎的危險局面。

從一般的角度講，政客是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投機者。這類投機者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右的投機者，以改革者的姿態，意在贏取開明領導的政治聲望；二是左的投機者，以惠賜人們平等的高姿態，聚集進入政治中心的民望。但這兩種人都不足以醒覺歷史大勢、都難以聚集最大多數的人群，更無法準確把握國家政治的脈搏。因此，他們也就無法以叱咤風雲的、高屋建瓴的政治籌謀，推動中國進入政治體制的改革之局。

至於官僚，則是在現代行政科層制度中尋求晉身之階的人士。這是一些隨時掙扎在「艾希曼陷阱」邊緣上的人士<sup>⑥</sup>。「平庸的惡」成為他們尋求個人加官進爵的趨同性選擇。這不是將官僚視為天生的壞胚子，而是他們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們的生存方式。由於超級政黨佔盡了國家的權力資源，因此促使大批具有光宗耀祖的功利心態、卻才能平平的人士進入權力體系之中，他們常常不事思考、僅僅自我作賤地服從行政上級的指令，因此成為缺乏公平、正義的價值判斷能力的尸位素餐者。他們確實隨時隨地在踏踏實實、不問正義與否地執行上級長官，尤其是政客的指令，從而保證基本的行政效率，但這種缺少價值關懷的行政官僚，是與真正公平、正義的政治生活不相容的。惜乎在中國需要啟動改革的當下，各級官員恰恰基本上被塑造成為標準的官僚人格了。這無疑強化了改革的推進難度。

政治家是具有勇氣和智慧，能夠因勢利導地改善政治生活方式、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士。他們能夠清醒地認識自己所領導的政治體的處境、所需要改進的地方，能夠及時準確採取相應的政治改革舉措，矯正政治體的健康運行方向，促使官民之間的融洽相處，推動政治體朝向穩定有序的狀態發展。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政治家，並不是有人指望的那種新權威主義者。他只不過是審時度勢、適時而為，應民之願、推進民主，展現技藝、推進改革的政治領導者而已。這樣的政治人格，正是當代中國改革需要塑造的理想政治人格。在這些人士與社會公眾的理性互動中，中國改革的歷史巨輪才能被有效推動。

從2011年的中國處境看，啟動還是不啟動改革，已經成為一個維護國家利益還是損害國家前途的嚴峻問題。儘管中國國內局面的激進化走勢，勢成不利於改革的狀態，但是，人們總體還是期待中國進入穩定有序的政治局面的。這無異於給改革留下了寶貴的空間或餘地；儘管中國國內讓人懷抱希望的改革，尤其是從公平分配入手緩解社會矛盾的舉措不多，但是人們仍然滿心希望這樣的局面能夠在和平寧靜的狀態下改變，因此為改革的溫和和推進提供了社會土壤；儘管中國國內的動蕩因素日益累積，人們都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但是，人們還是頑強地拒絕動蕩時代的到來，這無疑為理性的改革供給着心理資源。改，還是不改，已經成為不得不進行決斷的政治事務。好在溫家寶9月在大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再次激發起人們對中國改革的想像力。中國是否能在來年的政黨與政府換屆中真正開啟改革的大門，不妨拭目以待。

從2011年的中國處境看，啟動還是不啟動改革，已經成為一個維護國家利益還是損害國家前途的嚴峻問題。儘管中國國內局面的激進化走勢不利於改革，但是人們還是期待中國進入穩定有序的政治局面。這無異於給改革留下了寶貴的空間或餘地。

從中國的國際處境緊張化的趨勢看，人們需要自覺意識到，自1980年代以來三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明確的改變。當初中國啟動經濟體制改革之時，全世界都處在一個致力緩和衝突的相對寧靜狀態，和平發展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的映照下頗為誘人。而中國恰好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步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儼然崛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發展對資源的渴求，使中國不得不捲入世界範圍內的資源爭奪戰漩渦。國家間的矛盾凸顯，醞釀着國家間的經濟、政治甚至戰爭衝突的危險。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警惕，驟然增加：這種警惕既來自經濟利益的催迫，也來自政治利弊的權衡，更來自全球利益的爭奪。美國高調地重回亞洲，亞洲小國對美國勢力的回馬之局表示的歡迎，加劇了中國的國際緊張處境。從國家發展的整體選擇上講，北非和中東的社會動蕩與民主化浪潮，也給中央高度集權和一黨全方位地執掌國家權力的政體，構成挑戰。加之全球金融危機及其注定的停滯狀態，逐漸讓中國人感到經濟周期的寒氣逼人。恰當此時，中國膠着的改革，有形無形地呈現出「要麼改革，要麼傾覆」的背反局面。何去何從，所有中國人必須慎思。

從中國的國際處境緊張化的趨勢看，人們需要自覺意識到，自1980年代以來三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明確的改變。恰當此時，中國膠着的改革，有形無形地呈現出「要麼改革，要麼傾覆」的背反局面。何去何從，所有中國人必須慎思。

### 註釋

- ①⑧ 胡錦濤：〈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
- ②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0日。
- ③ 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常委會工作報告（摘登）〉，《人民日報》，2011年3月11日。
- ④ 參見張木生、周志興：〈共識之途——訪談張木生〉（2011年5月14日），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14/3545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14/35451.html)。
- ⑤ 參見李偉東、程敏：〈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綜述〉（2011年10月13日），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5113](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5113)。
- ⑥ 程敏、建軍整理：〈人民的勝利——紀念粉碎「四人幫」35周年座談會發言摘要〉，《中國改革》，2011年第11期，<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10-30/100318986.html>。
- ⑦ 胡錦濤：〈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3958405.html>。
- ⑨ 〈投資內地房產熱情降，千萬富翁六成欲移民〉，《香港商報》，2011年4月21日。
- ⑩ 〈大腕的出走〉，《中國周刊》，2011年9月15日，[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aid=5671](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aid=5671)。
- ⑪ 有報導指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中國知識精英的流失也成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來，中國有107萬海外留學生，而只有27.5萬人回國，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轉引自張榮楠：〈中國知識精英流失全球第一——「海外移民潮」背後的中美博弈〉，《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44期，頁21。
- ⑫ 程婕：〈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攜款8,000億〉，《北京青年報》，2011年6月15日。是文援引央行報告指出，「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份子大多逃往西

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這中間無疑包含着某種值得玩味的政治信息。

⑬ 論者指出，「在民主體系中，競爭性選舉使公民能夠選擇和拒絕關鍵的政策制訂者，從而賦予他們影響政策的機會。在大型社會中，競爭性選舉與成年人的普選權是真正『民治政府』的必要條件。相反，在威權政體中，政策制訂者是由軍事委員會、世襲家族、主導性政黨之類的政治結構選擇的。公民或者被忽視，或者被迫對政府的選擇表示象徵性的同意。」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著，楊紅偉等譯：《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116。

⑭⑮ 參見〈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和企業家座談會答問〉(2011年9月15日)，中國政府網，[www.gov.cn/lhdh/2011-09/15/content\\_1947780.htm](http://www.gov.cn/lhdh/2011-09/15/content_1947780.htm)。以下引述的溫家寶講話，皆出自該篇報導，不再另註。

⑯ 參見〈以改善民生為動力，推動重慶科學發展〉，《重慶日報》，2010年12月22日。2011年薄熙來在不同場合更加明確地強調類似的「共同富裕」的理念。

⑰ 參見〈廣東要為走好「中國道路」作出新貢獻〉、〈要按科學發展觀要求考核發展成績〉，《南方日報》，2011年7月11日。

⑱ 這已經是數年前的數據，最近數年只能是有增無減。參見〈「三公消費」之恥：「亞腐敗」消耗9千億〉，《法治早報》，2006年3月26日。

⑲ 參見〈專家解讀：中央綜治委為何更名〉，《檢察日報》，2011年9月27日。

⑳ 參見〈註冊慈善組織政策終於放開 中國慈善迎來春天？〉(2011年8月16日)，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6/8434790\\_0.shtml](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6/8434790_0.shtml)。

㉑ 參見戴蕾蕾：〈社會組織登記困境廣東破局〉(2011年11月30日)，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111130/n327393545.shtml>。

㉒ 參見〈民政部稱將實現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終結雙重管理〉，《法制日報》，2011年11月29日。作者引用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李勇的正式意見說，「『社會組織管理三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修訂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理順登記管理體制，最終目標是實現所有的社會組織實現直接登記。這樣做不是削弱管理，而是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和扶持。」

㉓ 參見〈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研討會——以廣東模式、重慶模式為例記錄稿 理性評說廣東模式、重慶模式〉，人人網，<http://xiaozu.renren.com/xiaozu/188076/334620241>。

㉔ 參見蘇偉、楊帆、劉士文：《重慶模式》(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㉕ 阿倫特撰寫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精到地分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具有的、共同的「平庸的惡」的特性。作為被分析的主角，艾希曼1906年生，曾在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戰後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獲，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其進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作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特派記者前往報導該審判，最終撰就本書。阿倫特指出，被人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惡魔」的艾希曼，實際上並不擁有深刻的個性，僅僅是一個平凡無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個人素質是極為膚淺的。在一種「平庸無奇的惡」的驅使下，他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命令。他根本不動腦子，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這樣的人在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超級政治言辭鼓譟下，做出一切惡行，都不令人驚怪。參見阿倫特(Hannah Arendt)：〈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結語·後記)〉，載阿倫特等著，孫傳釗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23-65。